

这一周

聚焦

浙大创新学术评价体系引热议

浙江大学日前出台新规,浙大在校师生在媒体及其“两微一端”发表的优秀网络文化成果,根据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可被认定为国内权威、一级、核心等学术期刊论文,纳入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该新规一经推出,立即引发了广大师生和网友热议。

根据浙江大学出台的《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优秀网络文化成果包括在报刊、电视、互联网上刊发或播报的,具有广泛网络传播的优秀原创文章、影音、动漫等作品。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运用正确思想文化对各种社会舆论和价值观念进行引导。

据了解,浙江大学对教师的评价标准体系较为多元,大学教师一般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职责,不同类型的学者可有所侧重,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的认定将成为这一体系的完善和补充。

作者:朱涵 余靖静
新华网2017年9月19日

“丝路”双甲子 “浙理”再出发

今年7月,广东考生高炜婷收到了浙江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的专业是丝绸设计与工程。这是浙江理工大学恢复丝绸专业以来,招收的第一批丝绸专业本科生。

浙江理工大学前身为有着120年历史的“蚕学馆”,于1897年创立,后更名为“高等蚕桑学堂”。2004年更名为浙江理工大学。

“丝绸行业不像互联网等行业处于一个快速上升的时期,选择进入丝绸行业的人才比较少。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要放弃对丝绸的研究、传承与弘扬,这个社会需要有一些甘于坐冷板凳的人。”浙江理工大学校长陈文兴说。

据不完全统计,“杭派女装”5000多个自创品牌中,有70%的品牌是由浙江理工大学毕业生创建或担任主设计师。2016年3月,在原有的材料与纺织学院基础上,浙江理工大学成立了“丝绸学院”。2017年,经教育部批准,学校又恢复了丝绸设计与工程专业,这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浙江省推进丝绸产业传承发展之举,也是建设高水平、特色型大学的需要。

作者:蒋亦丰 石丛珊
《中国教育报》2017年9月20日第1版

浙江传媒学院
学生实践团队深入基层

40摄氏度的高温,50多个日夜,391支队伍,4300名大学生……今年暑期,浙江传媒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的足迹踏遍全国的27个省份。他们有的深入乡间、海岛探访居民,重走浙江发展路;有的千里奔赴梁家河,重走习近平总书记青年路;有的“长征”再出发,感受“一带一路”倡议。

浙江传媒学院“传媒先锋班”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以“政治+经济+文化”的视野,分别对嘉善、舟山和乌镇三地展开调研。

戈壁、沙漠、城市、乡村,浙江传媒学院12名师生“重走长征路”,感受“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当地的新变化。

“青年大学生一定要听党话、跟党走,怀着一颗青春的报国之心、谦逊的学习之心、深厚的爱民之心,参加社会实践,知行合一。”浙江传媒学院党委书记杨立平说,“学校始终把社会实践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希望学生扎根基层了解国情民情,艰苦奋斗,磨炼意志品质,用青春书写华彩篇章。”

作者:袁蕾 曾静平
《中国教育报》2017年9月19日第1版

宁波镇海一学校
六载爱心帮扶北川学子

“张老师,您最近身体好吗?”一开学,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张芬红老师,就接到四川省北川县学生张洋杨的问候电话。

张洋杨是张芬红从2011年起就结对助学的对象,每逢教师节、春节等节日,他都会打电话向张老师问好。和张芬红一样,该校的不少教师经常会收到北川学生的问候电话和信件。在该校,北川已成为全校的一个牵挂。

张芬红是这个千里结缘的发起者。在她心里,一直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能去偏远山区支教。2011年“中国心品质助学北川”活动正在招募志愿者。她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两周的支教活动,让她感受到志愿活动的价值所在。

张芬红的爱心得到接力、帮扶得到扩大:从2012到2016年,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共为该基金募集61000元,累计救助了24名学生。

作者:刘波
《中国教育报》2017年9月18日第7版

本研究在了解少年儿童的快乐现状、探究运动、亲子关系、价值观等一些因素影响的基础上,课题组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少年儿童的快乐程度量化,构建少年儿童成长的快乐指数。

报告将“少年儿童快乐”(目标层)分解为身体健康、情绪积极、生活满足、人际和谐、人格健全、理想高远六个二级指标(准则层)。这些指标中,身体健康和情绪积极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反映了少年儿童较为持续稳定的健康状况,生活满足、人际和谐体现的是快乐理论中的“生活满意度”,人格健全、理想高远从成长和未来发展发展的意义上衡量少年儿童的意志品质和发展趋势。这些二级指标在前人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同时课题组还结合了我国少年儿童学习、生活、成长的具体国情和环境特征进行构建。

对三级指标的解释如下:

身体健康包含饮食平衡、睡眠良好、体格正常三个操作层指标。饮食和睡眠是维持少年儿童持续生长发育的必要环节,饮食和睡眠的情况能够直接反映少年儿童的健康状况和趋势。

情绪积极主要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体现。学者对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有较为明确的分类,医学与生理学的研究也证实了情绪对人体特别是少年儿童群体生理健康与发育的重要影响。

生活满足主要包括校园生活和课余生活。校园生活主要指在学校中的知识学习、思想品德教育、劳动技能培养等。课余生活包括家庭生活、课外学习、课外娱乐、体育锻炼、美育发展等。

人际和谐主要包括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及朋辈关系三个方面。

人格健全主要是指能够影响少年儿童快乐水平的人格特质。主要包括:乐观,即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坚韧,即对持续的、重复的事情保有耐心,不骄不躁;抗压,即在面对负面情绪和事件时能够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宣泄和疏导,避免造成更坏结果。

理想高远主要包括怀抱理想及努力实现两个方面。理想高远并且坚定的少年儿童,能够有更好的意志品质,更大的未来发展可能性。在为理想不断努力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感受到成就和乐趣。

城市少年儿童的整体快乐水平较高

我们根据综合得分法来计算少年儿童的快乐指数。在量表测试题部分,我们共获得了3114份有效问卷。经计算,少年儿童快乐指数平均得分为82.22分,主观快乐平均得分为84.99分。本次调查主要在城市进行,因此,这个数据说明我国城市少年儿童的整体快乐水平较高。

去除权重影响后,对统计的数据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二级指标“理想高远”平均分最高,“身体健康”的平均分最低。在身体健康二级指标中,造成平均分低的主要原因是睡眠充足一项。数据可见,“睡眠充足”的得分为3.36,在所有指标中最低。这说明睡眠仍然是影响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缺乏睡眠,不仅影响身体素质,还影响情绪与心情。

男生与女生各有各的“快乐”

在3114份有效问卷中,性别比例较为均衡。其中男生1534名,占总体的

49.3%。女生1570名,占总体的50.4%。性别比较发现,男女生的快乐水平无明显差异。课题组对男生和女生的得分均值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数据显示两组样本均值无显著差异。这说明,总体上来说男生与女生的快乐水平基本相当。这与以往其他学者进行的研究结论非常接近,说明总体上看男女在幸福、快乐上没有显著差异。

男生对自己的身体、心态的发展状况更满意,他们认为自己身体素质更好,心态比较积极;而女生对自己的情绪、人际关系、生活、理想等方面评价更高。

快乐程度随少年儿童年龄增长而下降

相关分析发现,年龄与快乐得分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约为-0.169。这说明,随着少年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快乐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

身体健康方面,随年龄变化呈倒U型,即中间年龄段的少年儿童身体健康方面的快乐程度较高,10岁最高,16岁最低。情绪积极方面,基本随年龄上升呈下降趋势,即年龄越大的少年儿童在情绪积极方面的快乐程度越低,10岁最高,17岁最低。人际和谐方面,随年龄变化呈倒U型,即中间年龄段的少年儿童人际和谐方面的快乐程度较高,10岁最高,17岁最低。生活满足方面,随年龄变化呈倒U型,即中间年龄段的少年儿童生活满足方面的快乐程度较高,10岁最高,17岁最低。心态积极方面,随年龄变化呈M型,10岁最高,17岁最

低。理想高远方面,随年龄变化呈倒U型,即中间年龄段的少年儿童理想高远方面的快乐程度较高,11岁最高,17岁最低。

在六个二级指标中,随年级显著变化的是身体健康指标,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小学四年级得分为39.95,初三得分为33.88,相差超过6分。这说明随着年级升高,学生对自我身体健康素质的评价降低。

成长环境是少儿快乐的重要因素

我们对7个抽样城市的快乐得分均值进行ANOVA分析发现,不同城市之间快乐得分差异显著。

快乐得分最高的是北京市(86.10),其次是南京市(84.66),第三位为广州市(83.15)。综合来看,一线城市少年儿童快乐水平最高,三线城市少年儿童快乐水平最低。从我国的东中西部来看,东部少年儿童的快乐水平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

影响少年儿童快乐的还有父母的受教育情况。通过调查,我们对少年儿童父母的受教育情况进行统计,超过半数的父母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三分之一左右的父母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12.5%的父亲和9.1%的母亲属于研究生以上高学历人群。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父母约占总体的四分之一。相关分析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快乐水平均呈正相关,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孩子快乐水平越高。

作者:孙宏艳 田丽

《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第14版

说吧

按学生习惯分配宿舍,
值得点赞

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观念超前,强调个性,更加注重个人感受与个人权利的表达。高校不能继续沿用以往的单向传导指令的管理模式了。

坚持早睡早起的你已经打算躺下见周公,喜欢晚睡的室友却一脸亢奋“起来嗨”。如果同一宿舍的几个小伙伴都是“夜猫子”或者都爱早起,那该有多好。这样美好的愿望对于南京大学2017级新生来说已经成为现实。据报道,南大2017级新生的学号顺序和宿舍安排,差不多都是按照学生们的生活习惯、卫生特点、学习特点等“个人元素”来“合并同类项”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相似的同学更容易“连号”,被排在一起。《扬子晚报》9月18日)

若学生宿舍里出现纠纷,往往是因为室友彼此生活、学习习惯存在不同。比如,有人喜欢早睡,有人喜欢晚睡;有人好静,有人好动;有人洁癖严重,也有人不太讲卫生,凡此种种,会给以后的矛盾埋下种子。懂得容忍还好说,一旦无法容忍对方,极有可能“擦枪走火”,产生冲突。生活、学习习惯不一致的人长时间共处一室,对彼此精神也是一种折磨。

南大对2017级新生根据兴趣、习性安排宿舍的做法,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过去,大学安排宿舍依据的是学号与报到先后顺序,不会考虑同学的性格与习惯。这种分配宿舍的做法对校方而言是方便的,但它忽略了人的差异性,根据一个编号来决定学生未来几年一起生活的人,难言科学。

要知道,大学宿舍不是旅馆,不是一个只用于睡觉的地方。它是休息的场所,也是生活的场所,还承担社交功能。如果一个人不能很好地与室友相处,不仅影响他的社交,也会波及学习成绩甚至人格。

南大的新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大学宿舍管理的僵化思维,它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基于大学最基本的理念:以学生为本。

大学的主体是学生,学校的规章制度,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意见,尽量做到人性化。但当下很多高校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最近,南方医科大学准备取消男女混宿的做法,就在校内外引起广泛讨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这项决策已经做出。虽说这一决定用心良苦,但对学生的意愿的尊重就不算妥当。

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观念超前,强调个性,更加注重个人感受与个人权利的表达。高校不能继续沿用以往的单向传导指令的管理模式,信息技术如此发达,高校完全可以借助大数据等新技术工具了解学生的需求,制订出合理的管理方法。

作者:姜木

《中国青年报》2017年9月19日



“园长证”须规范

石向阳 绘

《中国教育报》2017年9月18日

论作业本的正确打开方式

学生的作业到底该不该家长签字?新学期伊始,这个老话题再度在家长群里炸开了锅。有教育工作者提出:认真批改作业,是每一位教师的基本职责;认真完成作业,是每一位学生的基本职责;不再让家长给孩子作业签字。此言一出,叫好声、反对声、质疑声此起彼伏。小小的作业本,折射的是家校合作的大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近些年,随着“家校共同体”教育理念推广,借助网络交流平台,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联结越发紧密、互动日趋频繁。这对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的成长是好事,但也出现了一些“跑偏”现象,学生家庭作业变为“家长作业”即为个中典型。一些地方和学校甚至把作业的检查、纠错、评价等悉数交给家长,一些费时、费力、费脑的命题小报和视频作品等让家长“白天上班,晚上上课”,有苦难言……

把“家长作业”泛滥完全归因于学校和教师偷懒,有失公允。为“家长作业”纠偏,首先要弄清一个基本前提:虽然家庭和学校都是孩子成长中不可或缺的课堂,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站位、分工、方式和着力

点上都有很大不同,倡导“家校共同体”不是要把家庭变成另一个学校,把家长变成另一个教师。因此,一些学校和教师让家长深入干预甚至包办学生家庭作业、硬性要求家长定期参与学校卫生劳动、文体活动等做法并不可取。这样做不仅加重了家长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它不利于孩子对己负责的素质养成。

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老师”,在孩子的习惯养成、学业完成中理应承担督促之责,但包办代替则有害无益。学校教育具有职业性、专业性、阶梯性等特点,家长花费再多心思和精力,都无法替代教师在孩子进步中承担的角色。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家庭和教师就像一个人的双手和双脚,两者协同服务于一个躯体,但若将两者作用混为一谈,难免会让人由直立行走退化至爬行。

小小的作业本是学校和家庭、家长与教师之间良性互动、协调共进的纽带,它的正确打开方式或许是学生认真做、教师认真批、家长常过问。

作者:涂洪长

《北京青年报》2017年9月20日